

从西游记研究到西游学

——由《西游记戏曲集》一书想到

苗怀明

从玄奘取经到西游故事乃至西游文化,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发展演进过程,《西游记》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,小说之外,与此相关的戏曲、曲艺、诗歌、传说故事乃至雕塑、绘画等也都是这个庞大故事群乃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,在西游故事乃至西游文化的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《西游记》研究,如果从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胡适的《西游记考证》等著述算起,也已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了。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,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,《西游记》研究已经有了十分丰厚的学术积累,尽管很多问题比如作者、成书、版本、人物原型等还没有最终的答案。如果将当下的研究与新文化运动时期

的草创对比,可以看出,《西游记》的研究已经从单一的一部小说的研究演变为西游学的研究。

近年来,有研究者提出西游学的概念,对其内涵及特点,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。就笔者个人的理解,西游学显然是个比《西游记》小说研究涵盖范围要大得多的概念,尤其是小说作品之外的研究。这并非一个学术术语的简单

提出和应用,其背后的内涵则是值得深入体会的,那就是,随着研究的深入,需要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,对以往的文献资料进行整合,使研究在更为宏观和深入的背景下进行。

众所周知,过去的研究大多是围绕《西游记》这部小说进行的,问题的重视程度如何,研究是否深入,则视与小说的疏密关系而定。

如今,随着研究的深入,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,大家逐渐认识到,从玄奘取经到西游故事乃至西游文化,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发展演进过程,《西游记》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,小说之外,与此相关的戏曲、曲艺、诗歌、传说故事乃至雕塑、绘画等也都是这个庞大故事群乃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,在西游故事

乃至西游文化的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近读胡胜、赵毓龙校注的《西游记戏曲集》一书,颇受启发,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。

该书一共收录十八部西游戏,基本涵盖了目前学界所知的西游题材戏曲作品。就这些作品产生的时间而言,

(下转10版) ➔

◀ (上接8版)

适用面广,但契合度低,所以被诮为“约会多多,却无衣可穿(lots of dates, but nothing to wear)”。语文学从相对主义出发,聚焦于个性,契合度高,但适用面窄。极端一点来讲,语文学家的知识学问往往都是围绕着特定研究对象的,让其转而他适,几乎是不可能的,所以被诮为“严妆盛服,却无处可去(all dressed up, but nowhere to go)”(Sheldon Pollock, “Future Philology? The Fate of a Soft Science in a Hard World”, *Critical Inquiry*, Vol.35, No.4, 2009, p.947)。

在具体交流和认知的过程中,理论和语文学两种方法彼此相联。按照西方阐释学的说法,自我对他者的认识,都是从自我与他者的相同之处开始,从以己度人开始。随着阐释活动的深入,或者说阐释循环的扩大,不断发现并修正自己不正确的先入之见,与此同时,不断增加自己想象力和同情理解的能力。

理论当然有其积极意义,但也有其局限和问题,特别是其中的预设立场和意识形态,值得警惕。所谓对理论的抵抗,着眼点即在于此。

(9)

“语文学”一语涵盖范围也



狐狸和刺猬这个比喻源出古希腊阿尔齐洛科斯,因以赛亚·伯林(左图)的引用阐发而广为人知。

比较广,包括古籍文本校释学、语言学、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等等,不一而足。也就是说,传统语文学后来分化为多个现代学科。詹姆斯·特纳(James Turner)《现代人文学科被遗忘了的源头:语文学》(*Philology: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*, 2014)开篇引用了那句著名的格言“狐狸知道许多事情,刺猬知道一件大事”,用其中的“一”和“多”来引出语文学与现代人文学科之间的一源多流现象。值得注意的是,特纳并没有论及狐狸所知和刺猬所知的本质不同。

狐狸和刺猬这个比喻源出古希腊阿尔齐洛科斯(Archilochus),因以赛亚·伯林(Isaiah Berlin)的引用阐发而广为人知。伯林认为,作家

和思想家可以分为具有深刻差异的两类。一类是刺猬型:在他们看来,万事万物,共理条贯,可以执一以应万,故而“知道一件大事”即可。另一类是狐狸型:在他们看来,事物各有其理,往往彼此齟齬,需要逐一把握,因而“知道许多事情”。对于这两类,伯林是有倾向的,他更倾向于狐狸。人们常举的典型,马克思是刺猬,孔夫子是狐狸。

按照伯林的阐发,从普遍主义出发,聚焦于共性的理论家,是刺猬;从相对主义出发,聚焦于个性的语文学家,是狐狸。

卡尔·莱尔斯《古典语文学家十诫》第四诫是“不可妄称方法之名”,如今看来,这多少有点“抵抗理论”的意味。

我曾译介西方校勘学,于

是有人向我当面笑言挑战,说请举出一个例子,一个问题,中国传统校勘学方法解决不了,只有西方校勘学方法可以解决。还真不知该从何说起。无论中国还是西方,真正的语文学家或者说文献学家,都强调与研究对象的熟悉无间。这需要天长月久的功夫,而不是什么锦囊方法。

比勒尔《文法学家的技艺》:“如果说古代整理者在对校方法上有所欠缺,但他们却熟悉作者的语言,这一点,即使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也无法望其项背;用A·E·豪斯曼的话来说:‘他们用自己的骨髓来理解作者,因为他们与作者有着相同的骨髓。’”(《西方校勘学论著选》,113页注)

要熟悉古代语言文字,熟悉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,中国学者常说“寝馈于斯”“浸淫其间”,这与萨义德所理解的语文学:“念兹在兹,终身以之(a lifelong attentiveness)”正可相照。

唯有如此的投入和专注,才能抵达陈寅恪所说的“真了解”:“所谓真了解者,必神游冥想,与立说之古人,处于同一境界,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,表一种之同情。”(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)

中国的朴学与西方的语文学在细处容或不同,但在总体精神上是一致的。

尼采曾游走于“爱语文”

和“爱智慧”两途。早年从事语文学,曾因语文学家偏狭和迂阔而痛心疾首(《我们语文学家》)。后来致力于哲学,1886年为其《曙光》一书迟到的前言(1881年第一版没有前言,1886年第二版才补上)略有所辩,对自己的语文学出身倒有一番十分准确的评述,特别是拈出的一个“慢”字,尤为恰切。在目前人文社科项目大干快上、计日程功的火热形势下,尼采的这一番话倒不失为一剂清凉散:

语文学是这样一门令人肃然起敬的技艺,它要求从事者首先要做到——走到一边,从容不迫,变得静默和缓慢——这是一门施之于语言文字的金匠般的从容技艺;这门手艺必须慢慢从事,细细完成,不慢,不能成其事。故而现在语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;它具有最高的吸引力与感召力,在当前这样一个“干活儿”的时代:不得体不合理地慌张,如此急切地要立即“将事做完”——对书也是如此,无论是新还是旧。而语文学本身,却不是如此匆忙地要“将事做完”。它教人如何读好,也就是说,从容地,深入地,专注地,审慎地,心有所思,胸无窒碍,用灵活的指和眼。

吴金华先生常说,干我们这一行,就是要聪明人下笨功夫。此言虽浅,深意在焉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)